

日本浪人 與辛亥革命

趙金鈺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中国近代史专题研究丛书

日本浪人与辛亥革命

赵金钰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成都

责任编辑：蔡济生

封面设计：邱云松

技术设计：古 蓉

日本浪人与辛亥革命（平装）

赵金钰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13.125 插页3 字数305千

1988年4月第一版 1988年4月第一次印刷

ISBN7-226-00279-3/K·54(平) 印数：1—610册

定价：3.45元

E
+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概论	5
第二章 宫崎滔天思想剖析	47
第三章 孙中山与日本的大陆政策	70
第四章 浪人首领头山满	94
第五章 内田良平的东亚经纶	143
附录：《黑龙会备忘录》	
第六章 论北一辉	195
第七章 梅屋庄吉	236
第八章 萱野长知	268
第九章 川岛浪速与“满蒙独立”阴谋	281
附录：《对华管见》	
第十章 佃信夫与张勋复辟	331
第十一章 末永节和肇国会	346
第十二章 评《日本之亚细亚》	358
附录一、日本内阁表（1885—1932年）	389
附录二、日本驻华公使表（1873—1925年）	404
附录三、中国驻日公使表（1876—1919年）	407
附录四、主要参考书目	409

序

在辛亥革命前后，即日本的明治、大正时代，活跃于亚洲的大陆浪人的历史，是一个涉及范围很广泛的问题，应当引起研究中国近代史和辛亥革命史的学者们的注意，特别是辛亥革命史，如果缺少对日本大陆浪人的研究，有些问题将说不清楚。但面对大量右翼团体自己编写的书刊，要对众多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作出正确的判断也并非易事。不过在他们自己编写的书刊中，往往并不讳言他们自己的对外侵略和对外扩张的意图，这是对开展研究工作有利的一面。可是在他们的书刊中同时也存在着不少缺乏事实根据的地方，这就需要我们耐心细致地去寻找历史的本源，分析为什么违背事实的原因，探讨他们的最终目的。

日本大陆浪人与中国革命党人的往来频繁，有的个人关系非常友好。这里面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极少数人真正同情并热忱支持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党，如宫崎滔天、山田良政、萱野长知和梅屋庄吉等人；另一种是大多数人虽然在金钱和生活上热情援助和接待过留学或流亡到日本去的中国革命党人，如孙中山、黄兴和宋教仁等，但他们怀有以此为手段来获得中国利权的长远目标。

大陆浪人又称支那浪人，是一些活跃于亚洲大陆的“民间人士”或在野党人。他们创立了一些“民间组织”或政治团体。这

些组织或团体的主张有：自由民权、国权主义、国粹主义、大亚细亚主义、扩张主义、侵略主义、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等。因此他们大多数属于右翼团体。

浪人是没有领主或没有职业的破落武士或军人出身，他们为外务省或军部所派遣，或接受财阀、政客的资助，来到大陆进行调查和侦察，获取各种经济和军事情报，有些人平时在商店、大公司从事贸易活动，战时参加侵略军或担任翻译工作，为日本向中国和朝鲜等国的扩张政策服务。

但也有少数浪人本人就是资本家或跻身政界的，如头山满和平冈浩太郎二人都是煤矿资本家，平冈还担任过众议院议员，头山满本人虽然未在政界担任过职务，但他却能在幕后干涉和操纵某些政治活动。有些外交活动，日本政府不便出面，如扶植一些亚洲国家的改革家、反政府革命党人等，在他们取得政权之前，由浪人或浪人团体出面更为方便。

浪人和由浪人组成的右翼团体的出现是日本特有的历史现象。他们身上带有日本古代武士的某些特征，他们既有封建士族传统的国粹主义思想，又有明治维新后新兴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要求自由民权的愿望，还有财阀向外开拓市场和殖民地的需求。他们同日本政府的对外政策有时是一致的，但更经常出现的状况往往是不一致，而他们的最终目的与日本的大陆政策，如对中国来说，要攫取满蒙和进一步控制整个中国，这样的总目标是一致的。在昭和时代（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多右翼团体变成法西斯主义团体，这就同军部的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扩张主义合流而成为侵略主义（当然还存在着派系矛盾）。

为了帮助读者进一步了解浪人和右翼团体，我们不妨将他们同中国的秘密会社和帮会作比较。在辛亥革命时期，会党以其具

有反清思想而同革命党人联合，在反清革命斗争中起过进步的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封建帮派思想和流氓无产者的思想越来越浓厚，他们的头头缺乏创办现代资本主义企业的知识和从事政党政治活动的 ability，渐渐成为地痞、霸头，从事打击迫害民主人士和共产党的罪恶勾当。他们是一伙流氓、恶霸、“地头蛇”，有些人则开办一些戏院、赌场或妓院等。他们同日本浪人和右翼团体的最主要的区别在于：他们没有大亚细亚主义一类的对外扩张思想和掠夺别国利权的行动。

浪人在日本国内被某些人称为“国士”，即“爱国志士”。他们在国内并不是以地痞、霸头等封建帮会的面貌出现，而是自诩为自由民权主义者。他们继承了武士道精神，以拥护天皇为号召，提出自由民权的口号，是由于他们有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到甲午中日战争前后，逐渐变成国权主义，把目光转向亚洲大陆，首先是朝鲜和中国。他们充当日本推行侵略扩张政策的先锋，为财阀寻找国外市场和原料，为吞并朝鲜和掠夺中国，使中国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而努力，实现其所谓“八纮一字”、“大日本帝国”和“大东亚新秩序”的野心。他们同日本政府的矛盾，往往发生在他们主张及早发动对外侵略战争，而政府当政者稍稍迟缓些，他们就不满意；当日本政府迫于列强压力稍作退让时，他们就认为这是外交上的大失败；当政府不能为日本取得更多的权益时，他们就集会抗议、聚众闹事。他们经常为政府出谋划策，有些建议曾被政府悄悄采纳。政府有时也从外务省的机密费中拨款给他们去大陆作为活动经费。总之，他们同日本政府既有联系又有矛盾。他们的“爱国”是爱积极“对外经纶”的日本帝国。

由于浪人有“爱国志士”的美称，所以当时许多人不讳言自己是浪人，并以参加头山满主办的浪人会为荣。黑龙会首领内田

良平曾在《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一书的序言中说，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历史赫赫辉煌，其间“先觉志士”始终一贯、不屈不挠，对“东亚的经纶”倾注了心血，驰驱尽瘁的功劳居多。“回顾先觉志士挺身从事东亚经纶，实为我国对外国策的先驱，这些志士冒险凌难，破产捐躯，甘为祖国牺牲，创建对外发展的根基，为制定东亚的大势，常利导舆论，振奋人心，确立国是国策的基础，以致有今日之隆盛，其功业将使后人感奋鼓舞”。这篇序言是右翼浪人的代表作。

本书第一章概论是叙述辛亥革命前后大陆浪人活动的概况。从第二章以下各章以历史人物和事件为主线，分析他们的思想和历史事件的因果、特点。东亚同文会因其主要活动在1918年以后，故本书未设章节讨论。由于这项研究在国内还处于开创阶段，缺乏借鉴，因此本书定会有不少缺点和错误，恳切希望读者批评指正。如果这本书能够引起史学界、特别是研究辛亥革命史的学者们的兴趣，共同探讨这个问题，那将使我感到十分欣慰。

本书的出版，应当感谢四川人民出版社蔡济生同志的热忱鼓励和鼎力帮助。

作者 1987.2.26

第一章 概 论

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期，孙中山和中国革命党人把日本当作学习和避难的场所，结识了一些日本朋友，来往频繁，关系密切。这些日本人属于各种民间组织，他们自称是对外经纶的爱国志士，孙中山和中国革命党人也把他们看做是热心赞助中国革命的日本志士，在日本一般社会中，则称他们为大陆浪人。事实上，他们中间确有一部分人是热心赞助中国革命事业的，但另一部分人并非真心援助中国革命，他们活跃于亚洲大陆，是为了吞并朝鲜，同列强争夺中国的权利，在东北和蒙古建立傀儡政权。他们同日本政府和资本家有着微妙的关系；同时与中国的革命派、改良派、清政府、袁世凯，乃至宗社党，保持着政治的和经济的联系。弄清楚这些日本民间组织和大陆浪人对华活动的真实目的和意向，有助于对辛亥革命和中日关系的了解。

先介绍三个有较大影响的日本民间组织和它们的背景：

一、玄洋社

1880年，长冈护美（东亚同文会副会长）、锅岛直大和曾根俊虎（退职海军大尉，曾居中国北方多年，精通汉语）等人发起成立的兴亚会，是所谓在野关心中国问题之士的组织。创办兴亚学校，教授汉语，培养“中国通”。

1881年2月，头山满⁽¹⁾、平冈浩太郎⁽²⁾和箱田六辅在他们的向阳社的基础上，联合几个小团体，在福冈县成立玄洋社（取名于日本海波涛澎湃玄洋壮观）。其宗旨有三：（一）忠于天皇，（二）热爱国家，（三）保护人民权利⁽³⁾。玄洋社主张以日本为盟主的大亚细亚主义，在朝鲜进行颠覆活动，企图吞并朝鲜；它活跃于大陆，千方百计要把中国的东北和蒙古乃至俄国的西伯利亚，都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头山满鉴于当时清政府和朝鲜有宗藩关系，主张欲得朝鲜必先经营大陆，在中国得手之后，朝鲜问题自然顺利解决。自此以后，潜入中国大陆活动的人大增。东京有个卖眼药水的乐善堂药房，在上海河南路开设了一个分店，就成为日本浪人、政客彼此联络的地点。

1884年的中法战争，在福州也发生了战斗。日本驻福州武官小泽豁郎、驻上海武官曾根俊虎和驻芝罘领事东次郎密谋，趁机利用哥老会举兵夺取福州未成。他们感到人力不够，要在中国这样广大的领土内取得成功，没有健全的组织培养大批活跃分子来进行是很难收效的。于是在1890年由小泽豁郎、福本诚等发起成立东邦协会，其宗旨是：“小也者，对于从事移居、贸易、航海者，可供参考资料；大也者，可对域内之经纶及国家王道之实践，作万一之补缀，终至能对全部东洋人民之前途，起启迪作用

者，则吾人发起此一协会之微忱亦无憾矣。”⁽⁴⁾推举副岛种臣（内务大臣）为会长，近卫笃磨⁽⁵⁾为副会长。还创办俄语学校，培养俄国通。1894年会员已有九百余人，其中著名的有：大隈重信⁽⁶⁾、伊藤博文、小村寿太郎、犬养毅⁽⁷⁾、板垣退助、荒尾精、头山满、加藤高明等。

1886年，荒尾精（退职军人、浪人）在汉口开设乐善堂支店，并在宗方小太郎、山内崑、中西正树等人的协助下，在北京、天津、重庆、福州开设支店。于是他们就以汉口为中心，各处支店为联络点，深入内地进行调查。他们易服装、蓄发辫、口操汉语到处考察。以四川地区为例，他们非但走遍了整个四川，还进入西藏、云贵山区，调查了藏民、苗民等少数民族的状况。

1890年9月，荒尾精向日本政府建议，在上海设立日清贸易研究所（宗旨兴亚，东亚同文书院的前身）。荒尾精自任所长，根津一（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军人）为所长代理，宗方小太郎为学生监督，由农商务大臣陆奥宗光供给经费，陆军部招募学生，聘请中、英教师，培养精通中国内情的日本学生。1894年中日战争，该所教职员十九名、毕业生七十二名都奔赴战地担任军事翻译，或潜入中国探听军事情报。

二、东亚同文会

1897年，在甲午战争后，平冈浩太郎、犬养毅等因帝国大学和早稻田学校中，对中国问题感兴趣的人很多，发起组织东亚会，发行杂志，研究中国问题，并宣称：“允许辅佐光绪帝，力任变法图强之责的康有为、梁启超等入会。”⁽⁸⁾同年，兴亚会与东帮协会合并为同文会，以近卫笃磨为首领。1898年10月，同文会又与东亚会合并，取名为东亚同文会，近卫笃磨为会长。11月2

日，在东京芝公园红叶馆内举行成立大会，通过纲领和宗旨书。其纲领是：（一）保全中国。（二）协助中国及朝鲜的改革。（三）研究中国及朝鲜的时事，以期实行。（四）唤起日本国内舆论(9)。

当时日本政府是由宪政党组成的隈板（大隈重信、板垣退助）内阁。平冈浩太郎和犬养毅以进步党的关系，要求外务省增加给东亚同文会的机密费，他们的理由是，日本外交不振，就是由于外务省花钱太少，并不同民间外交协力之故。如果外务省能够增加机密费，拨款协助大陆浪人，使他们积极对外活动，日本的对外经纶必有起色(10)。隈板内阁不久倒台，山县内阁答应给补助金。

1900年，东亚同文会派山田良政(11)等到南京开办南京同文书院。由小川平吉、宗方小太郎在国内招募学生来中国学习。1901年迁至上海高昌庙，改称东亚同文书院，根津一任院长。1913年毁于二次革命炮火。1916年迁至徐家汇新校舍。随后又附设支那研究部，招中国学生。

日本许多关心中国问题的活动家都加入了东亚同文会，其中与辛亥革命关系比较密切的有：犬养毅、大隈重信、小村寿太郎、宗方小太郎、小田切万寿之助、伊集院彦吉、加藤高明、内田康哉、林权助、头山满、宫崎寅藏(12)、平山周(13)、山田良政、小川平吉、川岛浪速、中西正树、近藤廉平、澁泽荣一、白岩龙平、藤瀬政次郎等人。

近卫笃磨有一次在广岛演说，谈到东亚同文会的宗旨，要比其纲领讲得更明确些，现摘录其中一段：

“日本人（与中国人）在同种之外，又系同文之民，且同奉孔孟之教，所以在双方交情之间，颇多便利，远非其他人种所可

企及。固然，目前的中国，英则以长江一带为势力区域，德则据有胶州湾；俄略北清；法则谋据南清。但叶落归根，中国内部事业，必仍归同文同种的日本人之手，理极显见。……所以日本必须力求工商业的发达，以扩大吸取力。如欲求工商业的发达，则原料的供给，不若首先仰给于中国，而且原料精制之后，行销的顾客，亦必是中国。华人因不习于有秩序的事业，所以亦宜于与日人合办。日人的顾客，除中国、朝鲜之外，预计北方可至西伯利亚，南方可及南洋群岛，其需要之量，极为巨大。换言之，日本无形的领土，到处扩张，以待日人驾临，邦人前途，希望极多，岂可不奋然而起呢？！这就是东亚同文会所以要……在邦人之中，造就‘支那通’而作为第一着手的事业的原因啊。”(14)

1904年日俄战争的时候，东亚同文书院第一、二期毕业生大都从军，担任军事翻译。1907年，外务省在临时事件费余款中支出三万元，补助该院学生作为在中国内地旅行调查的经费。此项旅行，每年约用去一万元，调查范围遍于全国。此后由文化事业部在庚子赔款中拨给补助。每次旅行后将调查报告书专送参谋本部、外务省、农商务省。(15)

东亚同文会创办或编写的报刊书籍有：

(一)报纸 《同文沪报》(机关报，上海)，《汉报》(汉口)，《闽报》(福州)，《咸报》(后改为《天津日日新闻》，天津)，《亚东时报》(上海)，《盛京时报》(北京)等。

(二)杂志 《东亚时论》(机关杂志)，《支那》，《支那调查报告书》等。

(三)书籍 《中国年鉴》、《满洲通志》、《中国经济全书》、《中国省别志》、《清国商业总览》、《中国金融机

关》、《特种条约汇纂》、《中国名人鉴》、《中华民国实业名鉴》、《中国行会研究》、《山东及胶州湾》、《东部蒙古》、《蒙古及蒙古人》等。

三、黑龙会

1900年，俄国借口义和团袭击西伯利亚某市，派兵占领东北。近卫笃磨、犬养毅、头山满、小川平吉、中西正树等准备组织一个团体来对付这次事变，声言“保全中国”，实则反对俄国独吞东北。9月1日，上述五人同长冈护美、根津一、柏源文太郎、大石正已、山口正一郎、中村弥六等三十九人发起，在芝公园召开国民同盟会筹备会。24日，又在上野精养轩召开大会，到会者三百余人，发表宣言：“今联军既入北京，得达公使救援之目的，而撤兵之议，亦以时起。列国皆声言保全支那，清廷亦似有媾和之望，而露兵尚聚于满洲，益加支那之疑惧。……恢复东亚及世界之和平，以保全支那，以维护朝鲜，以自卫我国权利，……亦我日本国民之天职也。”〔16〕

政友会反对“保全中国”的提法，认为“列国倘议分割，我束手不能得寸地，可坐视耶？故欧洲各国倡言保全则可，若自我主张，反助长‘畏黄病’之势焰。误我国家，莫甚于是”〔17〕。因此政友会与国民同盟会分离。其实“保全中国”本是掩饰之词，政友会连这样的话也不要，而要马上参与瓜分。

年轻的玄洋社社员内田良平〔18〕在潜入俄国侦察，摸清了西伯利亚情况之后，回国就提出“对俄必战，日本必胜”的主张。这个主张比国民同盟会和政友会的意见更具体、更激进。得到了朝野许多人的支持。

内田良平是由他叔父平冈浩太郎一手培养，精通柔道的阴谋家。外务省曾拨机密费数万元⁽¹⁹⁾，要他在朝鲜利用东学党搞颠覆活动。他就与玄洋社社员等组织了一个团体叫做“天佑侠”，大书其宗旨曰：“扶助人道”。实则要吞并朝鲜。朝鲜请求清政府出兵平定东学党，日本就同时出兵。中日战争由此爆发。1898年，内田在《东亚时论》上发表一篇名为《俄国内部的大缺陷》的文章，揭露了俄国外强中干的真面目。

1901年1月30日，葛生能久、内田良平、可儿长一、平山周、伊东正基（知也）、葛生玄暉（东介、玄洋社）等二十余人，在内田良平家里拟订黑龙会旨趣书、规约草案。2月3日，在神田锦辉馆召开正式成立大会，通过旨趣书和规约。主张目前的急务是先与俄国开战，然后打进东北、蒙古和西伯利亚，为经营大陆奠定基础⁽²⁰⁾。推定内田良平为主干（首脑），佃信夫为主席，评议员三十名，干事三名。因为他们所要经营的地方是黑龙江两岸的东北、蒙古和西伯利亚，所以会名称为黑龙⁽²¹⁾。

黑龙会本部设在内田良平住宅内，发行《黑龙会会报》及《黑龙》月刊，登载会员侦察到的中、俄、朝三国的资料。同时设立黑龙语学校，教授俄语，培养“俄国通”。《黑龙会会报》第二集发表了一篇七十余页的长文《日俄实力的计算和战争的利弊》。日本政府怕泄密，下令禁止发行。黑龙会还刊行《最新满洲图》和《俄国东方经营部分全图》，是东部西伯利亚、东北和朝鲜的精密大地图。内田著书《俄罗斯亡国论》，除发行单行本外，还在东亚同文会的杂志上连载。

1903年，内田良平由平冈浩太郎介绍，向参谋次长儿玉源太郎（曾任陆军大臣）献策，主张马上同俄国开战，对日本最为有利。因为俄国西伯利亚铁道单线路遥，运输能力有限，若是从海

上运输，须花三、四个月才能到达东方，冬天海上冻冰，运输能力全失。日本还可以利用马贼（部分亲俄反日，部分联日抗俄）破坏铁道。儿玉听了大加赞许。实际上日本政府早就在准备战争了。于是对俄同志会、对外硬同志会、湖月会等团体纷纷成立。他们与国民同盟会都发表宣言，促使日本政府同俄国开战。东亚同文会、头山满和七博士等，也积极主张开战。玄洋社安永东之助（内田亲友）、萱野长知⁽²²⁾、金子克己、末永节⁽²³⁾等与宫崎寅藏商议，在头山满和内田良平的赞同下，与儿玉派来的花田仲之助（步兵少佐，东亚同文会）等军官组成特务班到东北，切断电线、破坏铁路、阻挠俄国物资供应，并由安永东之助等在东北招募“满洲义军”开赴前线。萱野长知等充当汉语翻译，并奉参谋部之命，专事联络马贼，扰乱俄军之后方。

1904年2月，在中国东北爆发了日俄战争，这是日、俄两个帝国主义为了争夺中国领土和在华各种特权而发动的强盗式的火拼。黑龙会和东亚同文会、玄洋社等民间团体和浪人起了推动的作用。

二

日本是这样一个国家，内部控制严密，活动范围狭小，这对于一些在政治上有抱负的人不能不是一种限制。他们欲求发展，只有把眼光转向邻近各国，首先是中国。清末的许多日本人士如头山满、内田良平和北一辉⁽²⁴⁾等，对内政不满，但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比较低，在国内政治舞台上难以施展开来，于是纷纷到中国大陆寻找出路。这当然要担些风险，但如果运气好的话，可以博

得一个发扬日本精神，为实现日本对外国策的先驱者的美名，取得政府或财阀的津贴，进而帮助解决东亚问题，奠定以日本为盟主的大亚细亚主义的基础，从大陆驱逐英、俄等帝国主义的势力，让日本有效地控制中、朝和俄国东部的权利。

犬养毅主张日本要欧美帝国主义化。他以在野党的身份活跃于中国大陆，同中国革命党人有相当密切的关系。他是大隈重信政策的积极支持者。他作为政党组织家在当时日本政界中拥有相当大的势力。

宫崎寅藏是犬养毅的积极拥护者，他们有深厚的友谊，他同头山满和头山的团体也经常有协作的关系。但宫崎与犬养、头山两派还是有所区别，宫崎以自由民权论为背景的家庭传统和教育，同孙中山的思想非常接近，两人又都信基督教，所以结下了巩固的友谊。宫崎也主张把英帝国主义的势力从中国和印度赶出去，他与犬养、头山在对内政不满和反对欧美列强侵略亚洲的意见上是一致的，因此他们能互相协力。

青年的宫崎，在国内得不到发挥他自由民权和人类同胞主义的机会，正在寻找出路的时候，他的哥哥弥藏极力劝他到中国大陆去活动，反对他早婚，也不同意他留学美国，并向他讲了中国的一些情况。这次谈话对他以后毕生所走的道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892年，他的另一个哥哥民藏给他旅费三百元，他就去中国考察中国的语言、风俗习惯和政治。他一到上海就喊道：“我的第二故乡！”⁽²⁵⁾不久旅费告罄。当时他的友人宗方小太郎正在日清贸易研究所当教员，主张中国占领主义，宫崎以主张不同，拒绝寄居该所，而寄居于日本邮船会社的上海支店。回国后结婚，三年没有什么活动。

日本政府在甲午战争取得胜利之后，发现清政府繁重的捐